



贵州大山里的梦想与传承

——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故事

□ 刘学文

在贵州惠水这片被山水温柔环抱的土地上,一个关于音乐与梦想的故事正在悄然书写。好花红童声合唱团,这支从大山深处走出的童声合唱团,正一步步迈向更广阔的舞台,将布依族的动人旋律传向世界。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约定,是一场文明传承的接力,更是一曲关于爱与希望的动人乐章。

故事始于2024年6月1日,一个充满童真的日子。我站在叶幸好花红书院门前,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心中涌动着莫名的期待。这一天,我们邀请了贵阳瀚微音乐学校校长贺丹一行,参加惠水县辉岩民族小学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当瀚微音乐学校向辉岩民族小学捐赠钢琴时,孩子们雀跃的身影在阳光下跳跃,像一群追逐花丛的蝴蝶。然而,贺丹老师的眼光却停留在那些孩子唱歌时的模样——他们的声音纯净如泉水,却因缺乏专业指导而略显稚嫩,尤其是那些悠扬的布依族民歌,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渐渐失去传承的土壤。那一刻,她的眉头微微皱起,似有千钧重负。我与她坐在书院简陋的阅览室里,听她讲述对民歌传承的担忧,也听她心中萌生的那个炽热的念头:组建一支童声合唱团,让大山里的歌声飞向更远的地方。我们相视一笑,仿佛看见一颗种子在风中轻轻摇曳,等待破土而出的时刻。

在惠水县政协、惠水县文联、惠水县辉岩民族小学的鼎力支持下,2024年6月18日,好花红童声合唱团和花儿与少年手风琴组合在叶幸好花红书院正式成立。当那些身着布依族服饰的孩子站在台上,用略显生涩的动作接过牌匾时,他们的眼神像山间的溪流般清澈,却又藏着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半个月后的7月8日,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辛先生与惠水县政协主席王昌茂来到书院,为合唱团授牌。叶辛先生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轻声说:“这些歌声是山水的精灵,我们要让它们飞得更高。”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也为合唱团发来了祝贺视频,并邀请合唱团到厦门演出。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历史在耳边低语:六十多年前,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从这片土地出发,苗族歌手把这首歌唱到北京城,唱进中南海,被周总理誉为“苗家金凤凰”;如今,新一代的孩童将再次踏上征程,用歌声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篇章。

组建合唱团的路途并非坦途。一年来,瀚微音乐学校的老师们风雨无阻,每周从贵阳自驾到辉岩小学,为孩子们带来专业的音乐指导。从基础的发声练习到民歌情感的细腻表达,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汗水与坚持。记得第一次训练

时,孩子们站在教室的角落里,声音细小如蚊蚋,仿佛生怕惊动了窗外的山雀。但渐渐地,在老师们的耐心引导下,他们的歌声开始有了力量,像山间的溪流汇聚成河,奔腾不息。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旋律在他们口中流淌,时而如清风拂过刺梨花,时而如春雨浸润红土地,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吟唱,让人感受到文化的血脉在悄然涌动。

然而,梦想的翅膀终究需要现实的支撑。今年5月中旬,当合唱团即将踏上赴厦门演出的征程时,资金短缺的困境像一座大山横亘眼前。出行前的半个月,我们仅筹集到13000多元,离20多万的预算缺口悬殊太大。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指导老师贺丹、贵州省同心光彩事业基金会秘书长薛妮红着眼眶走进我的办公室,她们的声音带着颤抖:“刘院长,孩子们已经练了整整一年,连放学路上都在哼唱旋律……如果因为钱去不了,他们该多失望啊!”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望向窗外那片熟悉的群山,忽然想起郑小瑛奶奶的“山海之约”。是的,山与海的距离,从来不是地理的阻隔,而是人心的温度。我握紧她们的手,鼓励她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剩下的,交给命运。”这句话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无数人心中潜藏的善意。贵州省慈善联合会闻讯而动,会长陈鸣明亲自部署,副会长王扬专程到多次现场办公,贵州省慈善联合会文化教育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宝英、副主任委员张寒松、王松雪等奔走协调。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一个个名字如同繁星汇聚,共同托起这片梦想的天空。当经费终于到位时,我望着那长长的捐赠名单,泪水模糊了视线——原来,爱与希望真的可以跨越山海。

5月30日清晨,惠水的大山还未苏醒,合唱团的孩子们已整装待发。他们背着小小的行囊,脸上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神情,像一群即将出征的战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走出大山: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新奇,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惊讶,第一次走进厦门大学的震撼……每一个瞬间都成为他们生命中璀璨的星辰。当他们在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的舞台上站定,与乐队默契配合,用天籁之音唱响《好花红》时,整个音乐厅都被震撼了。96岁的郑小瑛指挥家站在台下,眼中闪烁着泪光,她颤抖着双手指挥,仿佛在与时光对话;陈鸣明会长亲自飞赴厦门为孩子们站台,孩子们才是贵州的未来。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早已泪流满

面。而远在千里之外的著名歌唱家罗秀英,看着演出视频哽咽道:“当年我带着这首歌走向北京,如今孩子们带着它走向世界,这是文化的重生和传承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些孩子不仅是歌手,更是文明的使者,他们用歌声在群山与大海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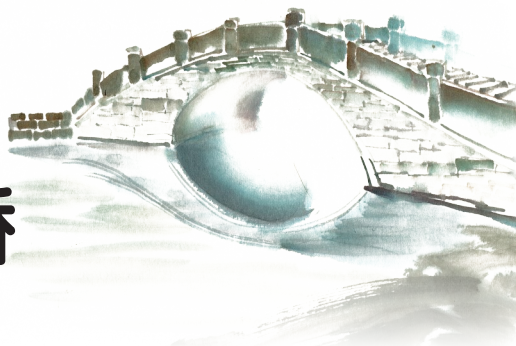
人们常问我:叶幸好花红书院与好花红童声合唱团都属于公益事业,应该由有关部门去做,你们没有财政拨款,还有许多误解和委屈,为何还要坚持?每当此时,我总会望向书院门前那片盛开的刺梨花。它们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却年年绽放得如火如荼。我生于这片土地,也曾为逃离贫困而远赴他乡,但当我经历过都市的繁华和人生风雨后,却依然选择回到这里。因为我知道,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能为他人点亮多少盏灯。那些孩子眼中的光芒,那些因歌声而重拾自信的笑容,那些因文化传承而凝聚的心魂,便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的意义,不在于赢得多少掌声,而在于让世界听见大山的声音,让布依族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绽放异彩,让每个孩子都相信:即使生于山谷,也能触摸星辰。

如今,合唱团的足迹已从惠水走向厦门,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常想起那个在书院与贺丹老师畅谈的午后,想起孩子们第一次开口唱歌时的羞涩,想起社会各界为筹款奔波的背影……这些画面交织成一张名为“爱”的网,托起了无数梦想。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群人的接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物质的丰盈,更需要精神的滋养。好花红童声合唱团用歌声讲述着大山的故事,用行动诠释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们像一颗颗种子,将文化的根脉播撒向更远的土地。

我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是文化的火种,当童声遇见民歌,便是文明最美的传承。未来的路上,或许仍有风雨,但那些在歌声中成长的孩子们,终将在音乐的陪伴下,如刺梨花般灿烂绽放。山海之约,永不落幕;文明之火,永续相传。

■ 刘学文,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报告文学集《中国税务启示录》、散文集《结满相思果的季节》、访谈录《与中国高层面对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访谈录》等,现为第十三届贵州省政协委员、叶幸好花红书院院长、叶幸荔波文学院院长。

随笔
杂谈



一座古桥

□ 陈占相

这是一座鲜有人迹的古桥。从县城出发,沿着涟江河岸,穿过一些稻田、花圃和农家小院,半小时左右就到了桥边。

古桥为七孔相连的石拱桥,横跨江面二十余米,桥的两头一直延伸到郁郁葱葱的田畴里。桥墩上的石块已些许缺损脱落,桥孔已略微变形,那些从桥墩缝里旁生斜出的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曳。

在一块块竖立的条石上,依次用两米多长的条石横接便成了桥栏,稳固、实用且美观。有些条石因常年有人歇坐尚有关感泛出,有些则留下若隐若现的纹路及图案,靠近细看,抚摸,能感觉到太多的光阴和故事在此沉积、凝固。

正是插秧时节,不时有劳作归家的人从桥上走过,几头耕牛还在河里悠闲“泡澡”,一群鸭子正从桥下“嘎嘎嘎”地拥挤着上岸。此时落日西斜,一层层泛红的余晖从桥面一直铺展到粼粼江面,古桥的倒影时隐时现,我觉得自己是站在一幅水墨画中,沉浸在那“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的意境里。

古桥侧面百米处,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桥车辆如织,正是它的启用,让古桥风貌完好如初。如今二桥相衬,在一动一静间更显古桥的沧桑厚重。一个赶牛过桥的老伯对我说:“以前这里多热闹,上学的,赶集的,干活的,全都得从桥上走过,我们年轻时还经常在这里对歌呢。”

老伯说得随意,我却听得仔细,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又是一年大丰收,人们从满是稻茬的田里走出来,洗掉泥土换上衣服,吃过晚饭便找到桥上,老人家家长短摆谈,小孩子穿梭打闹,而男女青年们则清喉亮嗓,那情意绵绵的山歌一首接一首,直唱到月亮落到了山坡背后。是哦,在这座桥上,不知留下了多少儿时的伙伴,走过了多少送亲的队伍,送别了多少远行的恋人。桥面的石板在泥沙覆盖下若隐若

现,我蹲坐下来,仿佛听到那“踏踏”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然后嘶鸣而去。千百年来,不论是官员商贾,赶考士子,还是贩夫走卒,这里都是南下罗甸、广西,北上青岩、贵阳的必经之道。而当地的人们,经此而走亲访友,赶集购物,劳作渔捕,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刻印在古桥上,也映在了江水里。

古桥周边,大大小小的村寨一个连着一个,一串串炊烟正袅袅升起。往北走的话,半小时左右就是县城了。我站在桥边一个制高点上,眼前的河流曲折轻缓,菜地里的村民正将新鲜的蔬菜装上农用车。再远一些,那新建的高架桥上车流如织,城区林立的高楼遮住了更远的山峦。

过桥往南沿着山岗步行十来分钟便是一个名为“卧龙”的路边集市,几十个摊铺随意地摆在大路两边,小商贩的叫卖声拖得很长:“卖——豆腐果喽,十块钱一串。”“刚摘的金钱橘,又香又甜。”声音来不及散去那浓浓的味道就已飘了过来,直让人不停地咽口水。

因处“卧龙”之地,人们便习惯性地称古桥为“卧龙桥”,关于它的来历,还得从一千多年前的五代时期说起。那时,楚王马殷派遣部将龙德寿率龙、方、洪等八姓兵到西南局部地区征讨叛乱,平定后分兵驻守平坦肥沃的惠水涟江两岸,并于公元940年在今卧龙一带设置南宁州,龙德寿为首任刺史。此后几百年间,这里一直为龙氏家族所治,也是物产富庶和兵家必争之地。

至宋、元时期,当初的八姓兵逐渐发展为“八番”土司势力,随着商农渐盛,为保车马通畅,在涟江上架一座桥成了各土司族群的心头大事。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时任卧龙长官司官龙象带动下,周边的洪番司、小龙番司、金石番司等十二个长官司共同出资建起了这座桥,当时取名“心金桥”,即聚心合一之意。如今,古桥旁边的小龙、金石、洪番等村寨名字一如当初,只是司治的瓦砾早已颓落,那段建衙屯兵的历史,一两年消逝在涟江的河风里。

从历史脉络中得知,建桥之时,距贵州建省175年,距设贵阳府正好20年,距设程番府112年,距设定番州也就两年时间。而程番府原址就在过桥往东前行几公里处,即便岁月更迭,至今此处仍沿用“程番”之名。

天色渐暗,站在桥头望向四周,顿觉时空交错。不远处的城区里,灯光渐次亮起,附近耕作的人们已三三两两回到家中。此时的古桥更显苍老和孤独,不过在“哗哗”的江水伴奏下,它依然保持着一种洗尽铅华的沉静和韧度,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美——那是厚重、凝练、灵动的美。

■ 陈占相,黔南州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文学》《贵州民族报》等报刊。

岁月
沉香

诗花
烂漫

父亲与农具(组诗)

□ 胡光贤

锄头

老屋里,墙角斜倚着
一排排被岁月磨短的晨昏
锈迹在汗碱的铁刃上结出盐花
缺口里嵌着四十年土块的方言
木柄上蜿蜒的掌纹印记
比族谱更深地刻进年轮
当这些沉默的金属俯身大地
父亲的脊梁便成了
田垄上永不生锈的犁铧

犁

当犁尖刺破冻土时
稻香正在锈迹里渗出
木质犁身的凹痕里
蓄满季风与汗碱的混血
握柄处的血痂已凝成褐色
牛蹄溅起的泥星
在时光里长成倔强的稻穗
当黄牛替换水牛蹄印
父亲的影子始终钉在
季节的犁沟里,渐渐分蘖

耙

与犁互为镜像的铁齿
在水田里梳篦铁阴的褶皱
那些扎进脚背的星芒
至今仍在记忆的泥沼里
泛着暗红的磷光
父亲弯腰的弧度,恰好
吻合耙齿切入泥土的角度
被搅碎的暮色中
秧苗正从他指缝间
抽出新的脉络

箩筐

篾条间漏下的时光
积成经年的盐霜
当谷粒在腹内发出清响
父亲的皱纹便漫过丘陵
秋收时倾斜的筐沿
抖落满襟稻芒和玉米须
那些被汗水腌透的岁月
至今仍在某个潮湿的夜
在老了的空筐里
轻轻摇晃

■ 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选刊》《小品文选刊》等。

油菜花(外一首)

□ 刘志模

在《游子吟》的密密缝中
春姑娘赶早绣时黄嫁衣
花粉胭脂涂艳春天洞房
络绎脚步踩遍田间诗笺
花田叠影稠似锦入画框
天女散花飞舞美图片
收购上山下山乡韵味
油菜花旅行南来北往的春天

布谷鸟

声声划破山乡春色
播撒残冬丁点梦呓
画一幅绝世的佳作
激荡远山躁动激情
传递人间的大爱
家书直抵紫嫣红的春
一夜围护的萌芽
灿烂了又一年的丰景

■ 刘志模,中国乡土诗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遵义市第三届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民族文学》等,已出版诗集《山村话语》。



80版的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时,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村子的小伙伴们对追剧情有独钟,经常穿梭在漆黑的夜里,一点也不惧怕。那些岁月,我们追过的那些剧,一直影响着我……

小山村有30多户人家,只有两户人家有电视机,都是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信号不好,接收信号的接收器都是自制的,被叫做“外天线”。先将铝电线按一定的尺寸制成一个框架,在上面捆绑一支废弃的白炽灯管,一片蒸锅隔层,再安装在一棵很直很长的杉木上,立在院坝里,用一根柔软的电线把信号从自制接收器引到电视机上,这就是外天线的制作工序。到底是什么原理,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反正,安装上这个“神器”后,电视信号得到显著提升。当然,信号也不是很稳定,有时候电视机荧屏上的雪花点比较多。出现这种情况后,看电视的人们也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几个力气大的小伙子旋转外天线杆,里面的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视机,一旦交屏清晰了,就大声齐喊“好了”,外面立即停止转动。有时候,一晚上看两个小时的电视剧,要转七、八次外天线杆。

那时播放电视剧,一晚上只播两集,晚上八点准时开播,中途会插播五分钟左右的广告,第二集的后期还会插播《晚间新闻》。电视剧结束时,会告知“欢迎明天晚上继续观看什么什么电视剧第多少集多少集”。我们记这些规律比记老师布置的作业还要牢固。特别是电视剧结束后,荧屏上出现的“晚安”二字,给我们带来的不舍和渴望,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

每天下午,我们利用放牛的时间把作业赶完,慌忙吃晚饭,抢在八点前赶到有电视机的邻居家,小伙伴们在电视机前坐成一排,偶尔有“捣蛋鬼”直接坐在电视机前面挡住大家,也有的“小邋遢”直接坐在地上,“小邋遢”不会被骂,但“捣蛋鬼”是要挨骂的。电视剧开播前,大家纷纷讨论,口头回放前一天晚上的内容,当然也有对当天晚上即将播放的展望,操起了导演的心。电视剧一旦开播,大家就立即停止口头回放和料想,但凡有谁再多说一句嘴,都会被骂停下来。

那个年代,用电也不稳定,被村民们说成“打雷电、落雨电、风停电”,也就是打雷要停电,下雨要停电,吹风也要停电。停电的时候,我们追的电视剧就会中断,留给我们对剧情的很多遐想,心里会演绎中断那集电视剧发生的种种。记忆里,追的第一部电视剧是《杨家将》。每天晚上追,剧情不断深入。老令公杨业兵败自杀,大郎、二郎被下毒后遭杀害,三郎中伏后被马踏死,四郎被俘,五郎出家为僧,七郎被乱箭射杀弃尸荒滩……幼小的心灵被杨门父子的骁勇善战所打动。每位先烈牺牲时的惨烈,小伙伴们会偷偷擦眼泪,都在为杨家一门忠烈抱不平。

看完电视回家所用的照明,也是充满智慧的。通常用的是干竹杆或者是干的向日葵秆。这些材料都是利用放牛或者干其他农活时偷偷准备的,准备材料时是很勤劳的,比大人叫干其他农活积极多了。小伙伴们也有更高端的自制手电筒。凑齐五、六节大人丢弃的废电池,用三块竹片夹住,麻绳固定,一棵铜线接上电筒泡子放在正极上,铜线的另一端按在负极上。废电池电量很低,有时中途突然就没了,泡子瞬间就不亮了。有一次,我凑了很久,终于凑齐几节废电池,也学着制了一支高端的手电筒。使用了三天晚上后的第四个晚上,才到半路,突然就不亮了。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我摸着走在漆黑的乡间小道上,不经意间直接走进了水田,还把水田面上的冰扎了两个窟窿。那个时候,也根本不会觉得冷。

追的遍数最多的电视剧数《西游记》。剧情了若指掌。前一天晚上看了,第二天几个小伙伴在山上放牛,会安排好每个角色重演,每个人都是演员,每个人也都是导演。台词、动作,甚至是妖怪的眼神都演得淋漓尽致,就像剧中人物一样抢滩涉险,降妖伏魔,历经磨难。

除了追电视剧,偶尔也追电影。村子里有人家办喜酒,条件好一点的亲戚会请电影来放。第一次追的电影是《少林寺》,当然也追得乐此不疲,熟悉到觉远的每一个动作,说了上句话的第二句台词说什么,甚至还会与同伴模仿觉远和白无瑕的倾诉。记得有一次追《少林寺》,四个小伙伴硬是赤着脚,帮放映师傅背着影片和设备,跑到二十多里远的地方追电影。电影放完后,几个伙伴躲藏到人家牛圈楼上的草里过夜,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因为对觉远的崇拜,四个伙伴还同时剃了光头,当然分别都被自家大人揍了一顿,但是弘扬正义的想法从那时就刻在心里上了。

后来,条件稍微好了一点点,村里家家户户都买了十七英寸以上的彩色电视机,在家就能追电视剧,也没有了追剧路上的惊心动魄和聪明才智。再后来还添置了放映机,喜欢什么电视剧,直接租来碟子,一口气就追完了。但是,始终觉得没有以前那种追剧的感觉了。

现在,大家对追电视剧和电影的热情渐渐的淡了。但追剧,仍旧是我们这代人心里烙印,剧中的场景、情节、人物……对我们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杨门父子的忠诚、孙悟空的不畏与善战、觉远的正义……

■ 蒙勇,毕节市作家协会、金沙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民族报》《毕节日报》等。

留痕
岁月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

□ 蒙勇